

大家国学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胡适



《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

先秦诸子进化论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

禅宗的真历史与假历史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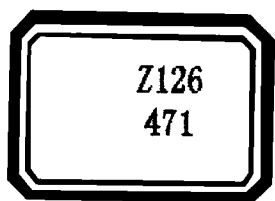
《水浒传》考证

《红楼梦》考证

胡适 著

沈卫威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家国学

胡適

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国学. 胡适 / 胡适著; 沈卫威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6

ISBN 978 - 7 - 201 - 05960 - 0

I. 大… II. ①胡… ②沈… III. 国学—中国—文集 IV. Z1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6038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题字 王元化

丛书策划 益琳福 成 之

大家国学·胡适

作 者 胡 适

编 者 沈卫威

责任编辑 伍绍东

特约编辑 曾 羽

美术编辑 兰 馨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1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960 - 0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问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 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〇〇五年,我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

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 from 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前 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界,有一个基本的对于现代学术的内涵的看法: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这是区别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关键,也是对学者思想方法的基本要求。新旧学术研究在精神上的差异是主要的。方法和材料倒是实在的,新旧学者都可达成共识的东西。因为学术判断的标准和争论的底线是:拿证据来!疑与信、批判与继承,精神或思想意识层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阵营。所以在“古史辨”的争论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造成的。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

胡适受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影响很大。他曾引用过西方一位学者所言,哲学上的争论,主要是概念之争,因为那是既不可证实又不可证伪的东西。推而广之,一些学术争论一旦陷入概念之争,就不可救药。这是胡适在学术研究中有意回避一些概念之争的缘故。同时他在《先秦诸子进化论》一文中强调:“荒诞神怪的万物原始论都不可算进化论。进化论的主要性质在于用天然的、物理的理论来说明万物原始变迁一问题,一切无稽之谈,不根之说,须全部抛弃。”胡适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我在《无地自由——胡适传》中有详细的演示,这里不重复。我所强调的一点是,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在《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三号

2 大家国学·胡适

刊有《杜威先生与中国》，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方法概括为“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胡适言简意赅，说实验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历史的时空转向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思想解放的一声春雷在神州大地炸响。相距胡适所强调的“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时间是五十七年。这是哲人和先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力量。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过来的章太炎门生钱玄同在一九三七年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写序中明确指出：“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

清末民初士人关于“国粹”、“国故”、“国学”的论说，都有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倾向，是民族主义的产物，具有反清排满和抗衡西学的某种文化意图。这既是文化认同和对历史上早期民族—国家想象的体现，又是为现实的民族—社会寻求文化精神上的依托的需要。以至于强烈的反对所谓“国粹”、“国故”、“国学”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的言论，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伦理倾向。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将“国学”细化为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后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基本上是循着这个路向来研究的。而传统的“国学”在章太炎看来应分为：经学、史学、小学、诸子、文学。但在胡适的思想意识中并不“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四日回复胡朴安要他加入“中国学会”的信中强调：“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

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

本书的内容选自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的《胡适全集》,版权由出版人和丛书主编从“胡适纪念馆”获得,我负责具体的编选。胡适有明晰的思想和可行的方法,我有意选取一些相对通俗的文章,也注意到一些既有经典的方法指导意义,又有“文本”价值的文字,如《〈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同时还考虑到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全面性,这其中有我个人的爱好与取舍。

另书中行述与现代汉语规范相抵牾之文字,完全尊重原有版本。

写下这些,权作前言。

沈卫威

目录

总序 / 1

前言 / 1

国学史纲

《先秦名学史》前言及导论 / 3

《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 / 12

《中国哲学小史》引论 / 32

先秦诸子进化论 / 38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 58

说史 / 64

国学思想

中国思想史纲要 / 71

谈谈中国政治思想 / 77

五行考 / 79

谈谈中国思想史 / 100

儒教的成立 / 103

新儒教之成立 / 105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 119

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 / 144

2 大家国学·胡适

格致与科学 / 163

禅宗是什么 / 166

禅宗的真历史与假历史 / 171

禅宗的方法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 / 181

国学方法

论国故学

——答毛子水 / 185

拟“整理国故”计划 / 187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 191

“研究国故”的方法 / 204

再谈谈“整理国故” / 208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 212

考证学方法之来历 / 224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 230

论证据 / 240

史学与证据 / 242

校勘学方法论

——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 / 247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 258

《水浒传》考证 / 281

《红楼梦》考证 / 318

大家国学·胡适

国学史纲

《先秦名学史》前言及导论

前 言

本书研究的目的与范围,我已在导论中有所论述。这里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用的论述方法及其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

既然本书要进行历史的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原始资料的选择。我在写这本书时所认为必须抛弃的繁重的资料负担,是西方读者所不能想象的。我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如无充分的理由,就不承认某一著作,也不引用某一已被认可的著作中的段落。对于儒家的“五经”,我认为只有《诗经》可以全部接受。至于《尚书》和《礼记》(除其中第二篇我认为是真的之外),我都故意避免引用。《管子》、《晏子春秋》及其他许多真实性可疑的著作都不加采用。经后人窜改过的著作,在选用时也特别小心,如《庄子》和《荀子》,就只分别用少数的几篇。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原文的校勘和训释。在这方面,我充分利用了近二百年来我国学者们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对于他们,我深表谢意。因为通过训诂的研究,我们才能摆脱传统训释者的主观偏见,并对古籍的真实意义获得正确的理解。

在断定原始资料的确实性中,我们曾不得不借助于所谓“高等校勘”。而高等校勘的另一方面则是确定年代。本书所涉及的哲学家的年代曾被中国的史学家草率地确定下来,我只采用了没有疑问的一个年代——孔子的年代。对于所有其他的情况,凡未经审定的材料都

加以否认,并只根据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证据和当代的证明以确定日期。

在这种工作中,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任务,当然就是关于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或重建。在这一点上,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

关于我解释这些哲学时与传统学问的不同之点,只能说一些:首先,我相信我把《易经》作为一部逻辑著作的论述所提出的新观点,似乎比以前任何其他论述都更能解决其中的困难问题;其次,讨论《墨子》的第三十二至三十七篇的几章,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未来研究者有帮助。

一九一七年六月于日本“皇后号”轮上

〔附注〕 这本关于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著作,是我于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住在纽约时写的。它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接受我申请哲学博士学位的部分要求。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后,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并写成《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它在两年中共印了七次,发行一万六千册。它所涉及的时期与这篇学位论文相同。而实际所使用的资料都包括在这本较早的英文著作中。但是,不断的研究,较成熟的判断,文字的简明以及专家的指教,使我的中文著作增加了许多新材料,这都是我在美国写这篇学位论文时所得不到的。最近四年,我很想有机会对这篇论文作彻底的修订,但由于工作的繁忙而搁置下来,这就是它长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国内的英、美友人曾读到我这本书的手稿,屡次劝说我把这本四年前写的书出版,我现在勉强地把它发表了。可以高兴的是这篇学位论文的主要论点、资料的校勘,都曾得到国内学者的热情赞许。这表现在他们对于这本书的中文修订

版《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的真诚接受,特别是关于我所认定的每一部哲学史的最主要部分——逻辑方法的发展。

一九二二年一月于国立北京大学

导 论

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这在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史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近代哲学就是以《方法论》和《新工具》开始的。而中国的近代哲学史则提供了更多有教益的事例。宋代(960-1279)的哲学家,特别是程颢(1032-1085)和他的弟弟程颐(1033-1108)要振兴孔子的哲学,曾发现一篇篇幅不多的名叫《大学》的小书(是上千年留下来的《礼记》这本集子里40多篇中的一篇,约有1750字,作者不明)。他们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后来便成为儒家经典《四书》中的一部。这桩有趣的事情的产生,在于这些哲学家是很着意于找寻方法论。他们在这小书中找到了那提供他们认为可行的逻辑方法的儒家唯一著作。这本书的主旨摘录如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段叙述由开头三句组成最重要部分。宋学以程氏兄弟及朱熹(1129-1200)为主要代表,主张物必有理,格物在于寻求特殊事物中的理。《《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理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①

以积蓄学问开始引导至豁然贯通的最后阶段的方法,在明代(1368-1644)王阳明(1472-1529)加以反对之前,一直是新儒学的逻辑方法。王阳明说:“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②

因此,王阳明反对宋学的方法,创立他所认为是《大学》本义的新学。他的新学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有身心上做。”^③离开心,既无所谓理,也无所谓物。“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④这样,王阳明认为“格物”中的“格”字,并不是宋儒所主张的“穷究”,而是“正”的意思,有如孟子所说的“大人格君心”的“格”。所以,“格物”并不是指研究事物,而是“去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简单地说,就是心之“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⑤

总之,中国近代哲学的全部历史,从十一世纪到现在,都集中在这作者不明的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小书的解释上。确实可以这样说,宋学与明学之间的全部争论,就是关于“格物”两字应作“穷究事物”或“正

① 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第五章。

② 《传习录下》。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